

中国传统民本观

周桂钊

【提要】中国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有民本思想。后来不断发展,突出的有孟子的民贵君轻,贾谊的民无不为本,柳宗元的吏为民役等。综合历史上的民本理论,归纳三条民本论的特点:一是倾听群众意见;二是以善为主,不轻信多数;三是经过协商,照顾少数。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投票形式是有用的,但不可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在有外国存在的情况下,强国也是利民的重要内容。现代中国继承传统的民本观念,吸收西方的民主投票形式,创造出先协商后投票的民主制度,比单纯投票的民主制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关键词】民本观 民本 民主 儒家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11) 03-0021-13

中国古代讲民本,现代西方讲民主。在西方科学和经济强势的情况下,许多人就认为民主是最好的,而中国的民本是不行的。我想民主与民本都是可以分析的,各有优势和不足,这可以从政治理论上分析,也可以从历史经验上探讨。

一、民本传统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很丰富,今将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一) 民为邦本

《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本指树根。国家像一棵树,民是树根。树根稳固,树才能正常生长。民稳定,国家才能安宁。民是国家的根本。这一段话出于伪《古文尚书》,在两千多年中,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谷梁传》桓公十四年:“民者,君之本也。”民是国君的根本。

秦朝建立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以后,虽然也

有一些人提出民本的思想,在实践中很难得到实行。例如《吕氏春秋·贵公》讲:“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天下就是天下人民的天下,不是君主一个人的天下。但是,秦二世就是将天下视为自己的私有财富,要求天下人民侍奉他一个人。秦二世认为尧舜禹艰苦生活不应该是天子的生活,他认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①二世说:“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②刘邦得天下后,问其父亲:“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我的事业财富与老二比谁更多呢?实际上就是将天下视为自己的财富。西汉贾谊在《新书·大政上》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这是民本思想的系统论述。贾谊说:“自古至于今,与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李斯列传》。

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①此后，不以民为本者，比比皆是，与民为仇者，不绝于世。他们正如贾谊所预见的早晚要失败。有民主观念的人当政，事事想到人民的利益。没有民主观念的人当政，他就胡来，让天下人为自己的私欲服务，最后搅乱天下，给人民带来灾难，也使他自已身败名裂，国破家亡。唐太宗深知这些历史教训，所以他一上台就注意人民的利益，提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经常想到前代亡国的教训，他就“不敢纵逸”。^②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明确说，“天下为主，君为客”。这与《吕氏春秋》的说法相一致。吕书中所说的“一人”就是指天子国君。黄宗羲明确君是客。封建制度不合理，就在于封建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君主是“天下之大害”，应该去掉。然后建立君、臣、民平等的社会，由君、臣、民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由学校来讨论政治的是非问题，制定“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这就是要建立平等、民主、自由的新社会。这里讲民主思想，已经有了涉及制度层面的内容，虽然还非常简陋。黄宗羲的民主思想已经达到封建时代能够达到的最高峰。

（二）民与天齐

《尚书·皋陶谟》：“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又说：“天命有德”，“天罚有罪”，“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这都是把民与天联系起来，借天的权威，强调民的重要性。统治者的责任在于“安民”、“利民”。西周时代，明智的统治者就提出天命论，认为天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③认为民的视听与天的视听是一致的，所以统治者要以“敬天保民”作为执政的理念，在民面前作威作福，就是得罪了上天。他们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④人民有什么愿望、要求，天会努力使它得到实现。这些事情做得如何，就决定了当政者自己的地位是否巩固。因此，他们又从理论上概括：“皇天无亲，唯德是辅。”^⑤德，指使人民得到好处。天没有亲戚，它只辅助能给人带来好处的有德者。他们把民抬到与天并列的崇高地位，说明他们

是极端重视人民的作用的。因此，敬天保民成为他们的政治纲领。在“民”与“人”的区别上，过去有人讲人是奴隶主，民是奴隶，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的产物，比较勉强，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大体，虽能解释少数资料，无法解释更多的理论与事实。中国传统重民的思想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突出的，历代统治者大多都是重民的。

（三）民为神主

春秋时代，敬神与保民作为社会风气同时流行。有的统治者重视神，祭神特别隆重，从人民那里搜刮来很多财富，准备祭品，作为敬神的物质条件。同时，他们每有大小事都向神请示，非常相信神，凡事都按神的意志（卜筮的结果）办。另外一些思想家把民放在比神还重要的位置上，要求统治者先把人民的事情办好了，然后再去向神表示敬意和感谢。例如，季梁说，治国之道就是“忠于民而信于神”。忠于民，就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要经常想着如何才对人民有好处，就是“上思利民”。他又说：“夫民，神之主也。”“民和而神降之福”，^⑥人民安居乐业了，神才会降福，统治者办事才会成功。“民不和神不享”，^⑦人民生活不好，神就不接受统治者奉献给它的祭品，当然也不会给他们降福。在敬神与重民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在儒家的典籍中，对只敬神都是持批判的态度，而对重民则持肯定的态度，这表明儒家是主张重民的，而且在孔子及其弟子、以至于后来的孟子、荀子，都有明确的论述。

（四）民贵君轻

无论是将民与天并列，还是主张民为神主，都说明西周以后开明的思想家已经有了重民的思想。当时普遍的观念还是天与神有崇高的地位，风俗是畏天敬神的。天、神的地位都在最

① 贾谊：《新书·大政上》。

② 《贞观政要·君道》。

③ 《孟子·万章上》引《泰誓》语。

④ 《左传》昭公元年引《泰誓》语。

⑤ 《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语。

⑥ 《左传》桓公六年。

⑦ 《左传》僖公五年。

高统治者天子之上，如果民与天、神并列，那么，很显然，民的地位应该在天子之上。这是很容易推导出来的。但是，这种思想到战国时代才由儒学大师、儒家亚圣孟子概括出来。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① 人民最尊贵，国家其次，国君排在最后。这就是著名的民贵君轻思想。为什么民比君还高贵呢？孟子作了这样的比较：一个人得到天子的赏识，可以当诸侯；得到诸侯的赏识，可以当大夫；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够当天子。用后来的史事作注解，就更容易理解。例如李斯本事很大，受到秦始皇的赏识，当了丞相，本事再大，也当不了天子。刘邦没有得到秦始皇的赏识，当不了丞相，却由于受到人民的拥护，当上了天子。由此可见，民是最高贵的。因此，得到人民，也就得到天下，失去人民，也就失去天下。怎么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就是要得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的向背是关键，它决定天下大势。孟子的这种民贵君轻思想就是肯定了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的因素。孟子认为得到人民真心拥护的人才能统治天下。谁能得天下，民心是决定因素，也可以说是民心主宰天下，主宰历史，或者叫民心决定论，民心史观。民心史观虽然不是唯物史观，其合理性、进步性，却是非常明显的。与唯物史观在重视人民大众方面则是高度一致的。

举两个例子来谈这个问题，可能会更明白些。

例一，春秋时代，齐国君死亡，两个公子争夺王位，一是公子小白，一是公子纠。管仲辅佐公子纠，为了阻止小白回齐国，管仲曾用箭射中小白的带钩。最后小白先回到齐国当了齐桓公，杀了公子纠。按当时的习俗，作为公子纠的拥护者应该殉难。拥护公子纠的召忽就是这样做的，自杀殉难。为主子殉难，当时称为仁。因此，子路问孔子：“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未仁乎？”孔子的回答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② 子路认为管仲没有为公子纠殉难是不仁的。孔子认为管仲为齐桓公称霸诸侯出力，是仁德的表现。此处两次讲仁，表示强调。在公子纠与齐国相比之下，在管仲与

孔子的心目中，齐国重于公子纠。孔子的另一弟子子贡也提到这个问题。子贡说：“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孔子回答：“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③ 这里再次讲到齐国霸诸侯，更提到“民到于今受其赐”。孔子在齐桓公之后一百多年，还受到管仲的恩赐，说明管仲的政治改革造福后代人民。为后代人民造福的贡献比诸侯称霸的功劳还大。人民与国家相比之下，人民高于国家。人民、国家、国君的重要性排序，孔子与孟子是一致的，都是将人民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国家，国君排在最后。一个官员一切听从国君的，从来不考虑人民的利益与愿望，那么他就不是儒家。国君如果是好的，他就是一个顺臣；国君不好，他就是助纣为虐的奸臣。

例二，唐太宗让父亲退位当太上皇，杀了兄与弟，自己当了皇帝。如何评价他的历史地位？宋儒指责他不孝不义，是个历史罪人。对于人民，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④ 建立了盛唐时代。无论对人民与国家，都是有大贡献的。逼父杀兄，何足道哉？宋儒不看大势大节，只究细枝末节，岂能公正评判！让孔子来评，也会与对管仲的评价一样。《礼记·丧服四制》有“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的说法。治理天下，就是“门外之治”，需要义断恩，就要以天下为重，心存百姓。当时形势，如果不是李世民当政，其他人当政，就不可能有盛唐。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夺权，是正当的，符合人民、国家的利益。如果不夺权，就要损害人民国家利益。同样道理，三国时代刘备不取荆州，碍于刘表的情面，是不义的。诸葛亮取荆州，则是符合大义的。如果心中没有人民，当政者必将成为历史罪人。心中没有人民，评价政治哪有公正可言！

（五）立君为民

君与民是什么关系？从儒家典籍中可以看

^① 《孟子·尽心下》。

^② 《论语·宪问》。

^④ 《贞观政要·君道》。

到,《尚书·西伯戡黎》载:在周武王领导人民要推翻商朝统治的时候,殷纣王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意思说我是有天命的,还怕人民吗?祖伊说:“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大意是:你罪恶滔天,天要惩罚你,你却将责任推给上天。上天按民的意愿,惩罚君。可见,在天意中,民重于君。《荀子·大略》:“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上天确立君即统治者,是为了人民,并不是为了君本身。如果君不为人民做事,就是违背天命,就要被废除掉。又说:“君,舟也;庶民,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都是说民是社会的真正主人。民可以拥戴君主,也可以推翻君主。君主的上台,是人民决定的。这就是民本思想,这里包含民主意识。君虽然不是投票选举产生的,他们都是人民选择的结果。这个选择的过程虽然不是投票,不是票数的简单多数决定的,但是,从历史上看,兴衰成败岂无凭?就凭民心所向。在历史的早期,民心表现在知识分子的倾向上。在春秋战国时代,并不是普通群众主宰世局,而是由众多的士即知识分子的走向决定世局的变化。这时的知识分子(贤士)则是民意的代表。从最后的根源上看,仍然是民众决定历史。秦国重用客卿,发展很快,从小邦升为大国,最后统一天下。从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以后,皇帝就成为政权的代表。人民的意愿通过各级官员反映到朝廷,皇帝进行选择。选择正确,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社会就安定,所谓长治久安;选择不当,不能反映人民的愿望,就会乱了天下,人民起来造反,导致改朝换代。秦始皇统一天下,表明秦的强大。但是,由于秦二世选择错误,诛李斯、去疾,任用赵高;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不肯“徇百姓”,要以天下奉一人,皇帝“肆意极欲”,秦二世“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①二世即位两年,天下开始大乱。勉强支撑三年,苟延残喘,终归灭亡。如此强大的国家在与民为敌的路线下,迅速灭亡,有力地证明了人民的强大力量。君与民的关系虽然间接,仍有复杂的联系,仍然表达出人民对当政者的最终选择。人们从历史事实中可以得出结论,历史的真正主人就是人民。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是这么说的,儒家是这么说的,马克思主义也

是这么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获得成功,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延续时间比较长,说明中国封建时代的制度在当时有许多优越性。社会发展以后,人们发现,没有民主制度,社会缺乏稳定性。中国人治,因人而异。现在说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柳宗元提出的“吏为民役”就表达了这种思想。但是,轻视中国文化以后,这些都不算数了。晚了一千多年的说法却成了创新见解。孟子讲“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就是表达人民群众的利益与要求。荀子讲的“立君为民”,正是以民为主体的典型说法。

(六) 吏为民役

唐代柳宗元总结了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提出“吏为民役”,更加明确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所有当官的都是人民用自己的税收雇佣的仆役。柳宗元也说:对于不称职的官员,人民“则必甚怒而黜罚之”。^②到了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有《原君》、《原臣》等篇。他在《原君》中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为主,就是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就是君“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就是皇帝要一辈子为天下人民服务。在《原臣》中说:“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天下就是人民的天下,以天下为事,就是为人民做事。如果当官是为人民做事,那么,与皇帝的关系就是像师生、朋友的关系。如果当官不为天下人民做事,那就是皇帝的奴才。柳宗元讲“吏为民役”,还没有涉及皇帝。黄宗羲认为皇帝也在民役之列,皇帝与百官一起为天下人民做事,都当人民的仆役。这就表达了彻底的“民为主”的思想。有思想不等于有制度,思想有指导作用,制度才有保证。而中国“民为主”只是一种思想,但就是没有制度的保证。特别是在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以后,君臣关系逐渐拉开,君臣与民的距离就更远了。“民为主”成为历代思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送薛存义之序》,《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6页。

想家所期盼的、非常渺茫的理想。许多七品芝麻官还自以为是人民的“父母官”，忘记了人民是自己的“衣食父母”。他们肆无忌惮，欺压主人，忘乎所以，严重颠倒了主仆关系。

(七) 强国利民

群众的意见也是变化的。经过一段时间，实践证明它是好的，最后会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的，会成为多数人支持的意见。我们从子产行政、商鞅变法，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强国利民的改革，开始也会受到各方面的围攻，既得利益者权贵反对改革，是怕自己的利益保不住。下层群众反对改革是受到上层人物的鼓动，也受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也表示反对。

子产刚开始任郑国相时，实行一系列改革，群众编出顺口溜，表示强烈反对。当时子产认真审查了自己的主张，还是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对的，是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坚持不渝，并且说只要对国家有利，自己宁肯牺牲一切，他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①子产自信政策没有错误，不怕别人议论，坚持不改。行政三年，群众热烈拥护子产的政策。商鞅变法时，也有许多人反对，变法成功，民富国强，群众看到好处，也表示拥护。这些事实都表达一个意思：善为众之主。正确的意见更能代表群众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真正代表群众的愿望。法家人物在政治改革实践中总结出这个道理：“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②要实行改革，开始不一定就要跟群众商量。只要改革方向正确，坚持改革，有了成效，人民就会理解和拥护。古今中外的先进性改革都要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抵制和反对，道理很简单，首先，任何先进性改革，都会改变群众的生活习惯、传统观念，因此群众首先反对；其次，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那些掌权的利益既得者必须拿出一些利益分给别人，他们不甘心付出，自然就会利用权力，也借口群众意见，来反对，有时还非常激烈。

吴起在楚国的改革，由于楚王的死亡，吴起就遭到贵族们的射杀。可见积怨之深，仇恨之大。利国利民的改革，还要有极大的勇气。孔子讲的智仁勇，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有智慧，才能真正往好的先进的方向改革，有仁爱之心，才知道如何站在弱势群体方面进行改革。如果改革的结果，使贫富差距扩大，以至两极分化，那么改革的方向可能就是错的。没有勇气，在群众的反对下，在权势的围攻下，就不能坚持改革，乃至半途而废。许多改革家都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敢于牺牲。他们是民族的精英，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国家的忠诚卫士，还是与祸国殃民的奸臣作殊死搏斗的忠臣。有时他们表现出残酷性，我以为多半是被逼出来的。

政治家如果心中没有人民，就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随心所欲，独断专行，就会自取败亡。王莽矜才拒谏，不听别人的批评建议，导致失败。隋炀帝也是这样，“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灭亡斯及。”^③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家与哲学家，合则两利，离则俱伤。哲学家与政治家怎么合呢？他们各为自己，就合不起来。只有在为了人民这个共同的目标，为了长治久安的原则基础上，才能合得起来。这就是在民本思想上的联合。中国历史上所有安定繁荣的局面，总是统治者为人民做了好事才可能出现的。一个政权的垮台，一般都是因为这个政权不能为人民做好事，还做了很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

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三民主义”，毛泽东倡导“为人民服务”，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胡锦涛强调“执政为民”，也都离不开“民”。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

^① 《左传》昭公四年。

^② 《史记·商君列传》。

^③ 《贞观政要·求谏》。

二、民本三大特点

中国古代有民本传统，却没有产生现代的民主制度。民本与民主相比，有什么异同？相同之处在于执政者重视人民的愿望，不同之处在于如何实现人民的愿望。

中国民本传统有三大特点：

（一）倾听群众意见

古代传说，尧时曾经设立“进善之旌，非（诽）谤之木，敢谏之鼓”，舜时“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①这就是听取并采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意见。后来，喜欢仿古的王莽当了新朝皇帝以后，“令王路设进善之旌，非（诽）谤之木，敢谏之鼓。谏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门受言事者。”“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者各一人，诣王路四门。”^②愿意倾听群众意见的形式，王莽都采纳了。但他个人自视过高，听不进群臣的意见，怎么能听进普通百姓的意见？不过是形式主义而已。从西周开始，中国执政者都很重视民的作用。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口号。尊重民的意愿，就要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然后根据这些意见来实施政治，尽可能实现群众的愿望。商朝就有召集群众议论大事的习惯。如《尚书·商书·盘庚上》载：“王命众悉至于庭”，讨论关于迁都的事。《尚书·商书·盘庚下》载：“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孔氏传：“言我当与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长居新邑。”这个“众”不是“臣”即官员，自然也不是全国人民，而是一部分民众。最后按群众讨论的意见定了新都。商末周初出现的《洪范》有“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的记载。认为这些都一致的情况，就是“大同”。庶人就是一般群众，区别于当官的卿士。《周礼·秋官司寇·小司寇》载：“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西周时代，有一种制度，在重大决定之前，要进行商量。一方面，

司寇到朝外向万民征询意见。国家大事有三件：一是国家危险的时候，即战盟问题。外国入侵，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或者要与别国订立盟约，这也与战争有关，都要与民众商议。二是国迁即迁都，首都都要迁移，也要与民众商量。三是立君，即确立新君，决定国君接班人，这也是与民众关系极大的事情。

《韩诗外传》卷三第三十一章载：

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其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诫之哉！子其无以鲁骄士也。”

周公封于鲁，因为自己要帮助周成王治理天下，让儿子伯禽到鲁国去任鲁公，治理鲁国。临行前，周公告诉他要谦虚，不要以鲁国骄傲，瞧不起士人。然后说自己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又是现任的天子相，地位之高，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他还非常谦虚、十分认真地听取士人的意见，以至于“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周公在执政的七年中，“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执贽而师见者十人，所友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所先见者四十九人，时进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万人。”^③“布衣之士”，就是没有当官的，被周公当作师长隆重接待的有十个人。当作朋友会见的有十二个人。“穷巷白屋”，指没有爵位的平民。古代服装与住屋都根据爵位高低涂以不同的颜色，以示区别。布衣与白屋是没有爵位的人的服装与住房。后代都以此代表平民百姓。至于“先见者”、“时进善者”、“教士者”、“官朝者”，意思是说接见的规格有等级差别。

在西周时代，就有邵穆公提出：“夫民虑之

① 《尚书·舜典》。

② 《汉书·王莽传中》。

③ 《韩诗外传》卷3，第31章。

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①人民心里想的意见说出来，按归纳形成的正确意见来实行统治，才能稳定社会，怎么可以堵塞言路呢？让群众说话，就不会垮台。“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对子产说：“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子产“不毁乡校”的消息传到孔子那里，孔子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②子产保留乡校，就是为了倾听群众意见。直到清朝初年，黄宗羲提出学校应该是议政的地方，也还是提倡倾听群众的意见。真心征求群众意见，表明执政者想要了解并代表人民群众的愿望。

听取群众意见，按群众的愿望治理社会，这是间接民主形式。中国古代也有过类似投票性质的站队数人的做法，只是为了解决某一意见分歧所采取的临时做法，并没有形成制度。

（二）以善为主，不轻信多数

不听群众的意见是不对的，听了群众意见，不加分析就照办，也不对。《吕氏春秋·不二》说：“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听了群众的意见，要加以分析研究，进行选择。否则，什么事也办不成，只能等着亡国。《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吴国进攻楚国，吴国派使者到陈国召陈怀公。陈国是小国，夹在吴、楚两大国之间。吴楚相争，陈国怎么办？陈怀公感到很为难，就向国人征询意见。国人意见分歧很大，讨论很长时间，莫衷一是。陈怀公说：“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支持楚国的站在右边，支持吴国的站在左边。陈怀公数一下人数，就知道支持哪一边的人数多。这大概就是两千多年前的“站队”问题，也是最早划分左派和右派。当时通过站队点人数，后来演变成放豆子，举手表决，无记名投票，再到电脑计票。民主形式可以不断发展，民主精神则是贯通的。陈国那次站队的结果，支持楚国的占多数，不支持发动侵略战争的吴国。

根据人数（即票数）的多少来决定大事，不尽合理。中国古代比较明智的思想家不是根据简单多数来决定大事，而是理智地审察群众的意见，经过分析研究，作出抉择。例如，《左传》成公六年载：楚军进攻郑国，晋国栾书带兵去救援郑国。郑国与楚国已经停战。楚国退驻蔡国。千里迢迢来救援，却没有打上一仗，白跑了。有的人主张到蔡国去打驻在那里的楚军，有的人不同意。赵同、赵括等将军力主向楚军开战，一决雌雄。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不赞成，认为救郑任务已经完成，可以班师。如果开战，胜了没有什么意义，败了会遭世人耻笑。主帅栾书决定撤兵。这时主战的将军们对栾书说：“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栾书说：“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主战者强调要服从多数，主战者八人，反战者只有三人。责问主帅为什么不服从多数人的意见？栾书说：如果两种意见都是好的，那么就应该服从多数。好意见才能成为群众拥护的核心意见。三位贤人的意见可以作为群众的核心意见，采纳这样的意见，不也是可以的吗？这里表明栾书的想法，贤人的意见，份量要重一些，不是简单地按人数多少来定的。“善”即好的意见才真正代表多数人的意见。群众是分阶级、分层次、分派别的，什么意见都有。如果不加分析选择，什么事也办不成，以此治国，必定亡国。以此治产，必定破产。

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③不能根据众人的好恶，来决定自己的好恶。自己的好恶来自于自己对评论对象的认真考察与分析。很显然，孔子认为众人的好恶未必正确。在另一处，子贡问：“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

① 《国语·周语》。

② 《左传》襄公六年。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③ 《论语·卫灵公》。

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①乡人皆好之，说明赞成这个人的占绝大多数，如果按现代投票办法，他准得多数票。但是，孔子不轻信多数人的意见，还要自己考察、分析，然后作出自己的评价。

总之，先秦时代，统治者重视听取人民的意见，群众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即使有比较一致的意见，也未必正确，也不一定就按群众的意见决策。统治者听取各种意见以后，再进行思考、分析，选择最佳方案。这是当时最合理的民主方式。正确的意见真正代表群众利益，最后会得到群众的拥护。

群众的意见也是变化的。开始的时候，多数群众可能代表传统势力，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善”的意见是好的，可能反对的人占了多数。经过一段时间，实践证明它是好的，最后会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的，会成为多数人支持的意见。我们从子产行政、商鞅变法，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三）通过协商，照顾少数利益

民主最重要的是尊重人民的意愿，维护绝大多数人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民主有形式与内容的问题。中国古人讲的民本，就是着重于民主内容或实质民主，由于没有一定的形式，受到当政者个人的素质影响极大。个人素质好，就能得到很好的体现，个人素质差，民本就成为一句空话。而形式就是指规范、制度。徒有形式也不行，因为任何形式都会被主体意识所歪曲。阴谋家可以在表面形式的掩盖下弄虚作假，欺世盗名，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例如：“齐田成子、越王勾践”都是以虚恩收买民心的人，“成子欲专齐政，以大斗贷、小斗收而民悦。勾践欲雪会稽之耻，拊循其民，吊死问病而民喜。二者皆自有所欲为于他，而伪诱属其民，诚心不加，而民亦说。”^②阴谋家可以用虚恩来引诱人民拥护他们。大德才是人民利益的根本，小惠收买人心则是别有用心。大德一亏，多数人民就会受灾遭难。小惠虽行，只能使一小部分人得到一点暂时的好处。虽然会产生作用，甚至一时得逞，终究不能长久。古代有这种情况，现代也有贿选现象存在，即使在最民主的

国家，不能真正体现民意的选举也经常发生。民主制度是形式，民主是手段，真正体现民意的是能够实实在在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领导者与社会制度。民主究竟应该是什么形式，投票是一种形式，不是最好的形式，却是当今可以采纳的行之有效的较好的形式。

投票需要先协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摸索创造出来的。在十多亿人口的中国，汉族占绝大多数，中共党员有七千多万，如果按选举的简单多数，就可能没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不了少数民族和其他民主党派以及特殊群体。经过协商，规定少数民族和其他民主党派的代表人数，其中有文化界的代表，工商界的代表，军队的代表，使代表大会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意愿，照顾到各种少数利益群体。我以为这种以协商为基础的选举制度，更具有代表性，更合理。民主是一种制度，吸取西方投票的形式，加上中国的协商过程，可以减少徒有形式的弊端，使这种形式更趋完善。民主也是一种观念，在知识分子的推动下，民主风气会逐渐形成，制度也会逐渐完善。理论与制度好坏，都是要在实践中检验的，不是说起来好听就是好的。选举制度和任期制度是有合理性的，从许多国家实行的结果来看是有优越性的。但这是相对的，因为希特勒也是民主选举出来的，谁也不能保证以后不会再选出希特勒式的人物来。在西方古代的选举，只有少数人参加，多数人没有选举权。仍然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这与中国古代也差不多。任何政府有执政能力，就会关注人民的愿望，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一旦失去执政能力，不能为人民做好事，人民自然会抛弃他们。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民主观念。中国历史上有过盛世，体现了民心的决定作用。有人说古希腊就有民主思想，其实，西方政治一直动乱，也一直改革，那时绝大多数人是作不了主的！就是现代，美国人民能够作主吗？美国侵略伊拉克是人民作主吗？

② 王充：《论衡·定贤》。

民主不是说了好听，要真正使人民得到好处，生活幸福。王充说：“夫太平以治定为效，百姓以安乐为符。”^①什么是太平？社会治理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就是太平。能够做到这样的制度就是好的，统治者就是有功于人民的。这是客观标准。过去谩骂历代统治者，是不正常的观念，现在仍然没有改变过来。

三、民本观念与民主制度

先秦时代的民本思想很丰富，进入秦汉以后，“民为本”变成“君为纲”。儒家概括出适应社会政治需要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理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被推翻以后，中国要走向民主，自然要用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取代“三纲”理论。民本论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民主思想。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民本思想还要有新的阐释，还需要创新的内容，也要吸取西方的民主形式的合理因素。

许多人不了解历史，认为西方人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了民主思想，而中国始终没有。英国女王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吗？两百多年前，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美国人能享受什么样的“民主”？如果美国人民早就有了真正的民主，华盛顿还闹什么革命？如果英国人给殖民地人民有充分的民主，美国人为什么要闹独立？主张全盘西化的人究竟思考过这类问题没有？为什么言必称希腊？民主怎么成了西方人的专利？

关于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如何评价的问题，也值得注意。

我们如果能够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对历史上出现的现象则需要进行历史性的分析，不能以现代的情绪审视评论古代的制度。恩格斯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可惜，这样做仅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周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

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深入地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取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②我们过去痛骂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只能说明这种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以及我们的感情，不是对这种制度的真正评价，也不是这种制度的历史地位。奴隶制在当时是巨大的进步，封建制度当然也是当时的巨大进步，资本主义制度当然也不例外。我们都能给一种新制度的产生以高度的评价，那么，我们就无法否定中国封建制度在它的产生初期的巨大进步作用。我们如果有历史的观点，就不可能简单地痛骂历史上所有统治者——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当政者，就不能简单地否定中国古代的天子、皇帝，不能否定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否定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同时也不能否定为他们献计献策的智谋之士、贤相忠臣、清官廉吏。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传承下来，每一代人都是有贡献的。否定前人的贡献，是历史虚无主义观念。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建设，不是离开这个基础来重新建设。资本主义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建设的，封建制度是在奴隶制基础上建设的。如果这些都否定了，我们只能回到原始社会，回到最野蛮的时代。这才是真正反人类的最反动的思想！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从秦汉时代开始，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直至明清，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贡献，即使不是盛世，也是这个长链上的一环，也是不可或缺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否定历史，是无知的表现。西方人认为学习历史使人明智。中国古人以史为镜，研究治国方略，古为今用，

^① 《论衡·宣汉》。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221页。

是重史的优秀传统。没有历史观念的人，不尊重古代圣贤的人，思想之浅薄，境界之低下，都是很自然的。

民本观念是内容，民主制度是形式。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也是历史的主人。民本思想，民为贵，很多人觉得太抽象了，不好理解。我们举一个例子。在春秋时代，齐襄公死后，公子纠奔鲁国，管仲与召忽辅佐他。公子小白奔莒，鲍叔辅佐他。公子纠与小白都从外地赶往齐国，管仲带兵去拦截公子小白，曾经箭射小白的带钩上。最后小白先赶到齐国，当上了齐桓公。鲁国迫于齐国的压力，杀了公子纠。辅佐公子纠的召忽自杀，管仲没有自杀，鲁国将他送回齐国。齐桓公对管仲“厚礼以为大夫，任政。”^①春秋时代有这样的规矩：辅佐谁，就要“忠”，当君主遇难时，就要殉难。召忽就是这样做的。如果不殉难，就是不义。孔子的弟子也曾多次提到这件事，孔子都作了肯定的回答。《论语·宪问》：“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国的盟会，没有使用武力，这都是管仲出的力。这就算他的仁德吧。这应该是大仁大德。子贡也问到这件事。“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②孔子这里讲到的齐桓公“霸诸侯”就是管仲为齐国的社稷所作出的贡献。孔子还感受到管仲为后代人民的开化文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正符合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仲没有死难于公子纠这个“君”，却为齐国的“社稷”和天下人民做出巨大贡献。有什么可指责的呢？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包产到户是争议的问题。集体化的二十多年中，国家每年收购粮食300亿~350亿公斤。搞包产到户后，1984年粮食年产量达到4000亿公斤。农业总产值增加了68%，农民个人收入增加了160%。在讨论中，有的人认为不走集体化道路，搞包产

到户，是走回头路，是脱离社会主义。另一些人认为，包产到户，农民可以吃饱饭。最后集中到这样的问题上，万里问：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对方答：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③按孟子的说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么，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社稷，群众就是最高贵的人民。这就是民本观念。所有当政者必须树立民本观念，一切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有的人能够这样想，有的则不这么想，却也这么说，只是在关键时候滥用职权，为自己谋私利。因此，需要制订严格的民主制度，防止职权的乱用、滥用，来维护人民的利益。民主制度是需要的，如果没有制度，只能凭良心办事。有些没良心的人就可能胡用，给人民造成极大伤害。小人当政，危害一方。有良心的人当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建立健全民主制度，如果没有民本观念，那么，这种形式就会被利用，就会被曲解。因为形式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活人要利用死形式搞歪门邪道，那么，这时的形式也就失去规范作用。正如孟子所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④只有善良的心理，做好政治还不够条件；只有法律，自己也不能实行。明显的事实，德国希特勒就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去的，后来给欧洲造成那么大的灾难。这就是只讲形式的教训。有的说欧洲有民主的传统，而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从民主发源地的欧洲爆发的。这应该可以说明问题。后来一些人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如果读一读梁启超的欧游日记，也许会受到启发。那时的情境，那时的心态，欧洲人是如何看待民主制度的。

毛泽东在领导革命的时候，创造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强调要先当群众的小学生，向群众学习；又不能当群众的尾巴。领导者要有自己的思考，要集中群众

① 《史记·齐太公世家》。

② 《论语·宪问》。

③ 《报刊文摘》2008年7月7日，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

年6月22日，http://www.123456789.com/

④ 《孟子·离娄上》。

的正确意见，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到现在为止，所有问题如果都靠投票来决定，其弊端也很多。有的利用金钱和权力造势，有的在投票中捣鬼，有的向选民承诺很多东西，选上以后又不兑现，甚至背道而驰。有的用民主投票选出独裁总统，有的一边喊人权，一边否定别国主权，不尊重联合国的权威，不尊重其他民族的主权，还有什么资格谈人权。随便践踏一个国家的主权，还会尊重一个平民的主权吗？谁能相信它的“人权”是真的？投票可以了解群众的愿望，辩论可以阐明事情的道理。所以，经过辩论，酝酿成熟，最后投票，也许更合理一些。中国基层进行投票选举，情况比较复杂，说明民主制度还需要不断发展、完善。有的搞等额选举，只能分别候选人的票数差别，无法把不合格的候选人选下去。选举比不选举好，差额选举比等额选举好。这就是不断进步的过程。往回改，就是社会的倒退。我们既不要认为实行投票就万事大吉了，也不要因为有些投票选举结果存在种种问题而认为投票应该取消。总之，当代中国的民主，是通过选举代表的间接民主，是中国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吸收西方文化的一种表现。我们需要选举，但不迷信选举。在全民族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选举也会日益完善，真正民主的水平也会不断提高。

从民本，到协商民主。这是中国传统民主思想的发展进程。

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是历史的主人。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就有了。孟子的说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①朱熹注：“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②后人归纳为“得民心者得天下”。谁能得天下当天子，是由人民决定的。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③贾谊说，“民无不为本”。柳宗元说，“吏为民役”，都是最典型的人民是社会主人的

说法。

我们把承认人民是社会历史的主人的思想观念称为民主观念。中国古代只有这种民主观念，或者民主精神，但还没有形成民主制度。不要以为只有西方那种民主方式才是民主。在历史上也不是民主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

民主有两种方式：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直接民主由所有成年居民直接参预政治，投票选举各级社会管理人员。这是现代的民主形式。间接民主是由居民用不同的方式间接参预政治，主要是通过一些代表人民利益的优秀人物来掌握政权，处理政务。这就是中国古代人民盼望明君贤臣的观念，也是君臣和士人的民本思想。从理论上说，民主就是要让群众说话，充分表达他们的愿望。当政者要倾听群众的意见，让群众有机会充分表达自己的愿望，要根据群众的愿望与实际情况，采取措施，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出最有效的服务。中国传统所讲的“民心”、“民意”，颇受历代开明的统治者重视，实质上就是间接民主的意思。现代最简单的概括，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者“为人民服务”。这种思路与制度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实践中都是适用的，收到较好的实际效果。这可以说，执政者大体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反映了群众的愿望。有的执政者随心所欲，贪图享受，不顾人民死活。人民生活不下去，起来将其推翻，另拥新的领袖。这就是改朝换代。也是说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历史上也有过欺骗民心的现象。齐国田成子，以大斗贷小斗收的办法收买民心，最后达到他的篡夺齐国政治的目的。越王勾践为了雪会稽之耻，拊循其民，吊死问病，也得到人民的拥护。他们不是真正关心人民，而是别有企图。政治家的假装爱民，也会暂时获得支持。

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提高以后，会逐渐改进民主制度，使之适合新社会的新情况。应该说，

^① 《孟子·尽心下》。

^② 《孟子·离娄上》。

^③ 《荀子·哀公》。

现在中国的人民代表制度还是间接民主的制度。在小范围内可以实行直接投票的选举办法，对于地域如此广大，人民如此众多的大国，全民直接选举，并不一定是最合理的。中国政治的改革会逐渐完善选举制度。

这可以叫做民主意识或者民主观念。

民主观念与民主制度还不一样，有民主观念，如果没有民主制度，那么这种观念在实践中能否实行，则没有保证。有的君主比较开明，民主观念可能实行得好一些；有的统治者将民主观念抛到脑后，不顾人民生活，追求个人享乐，最后弄得天下大乱，亡国灭族，身败名裂。虽然最后，还是人民胜利了。在人民胜利之前，人民却需要在水深火热中煎熬一段时间。

最后，我要说的是，民主制度是一个历史概念，过去不存在，后来产生了，有它的优越性，合理性。以后，也必将有更加合理的社会政治形式来代替它。在古代，东西方都没有民主制度的时候，中国的民本思想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推动社会的前进和发展。黄宗羲的民主思想是先进的，灭亡的明朝和新兴的清朝都不能接受这种革命性的改革，中国只能在历经磨难后，才会逐渐认识民主的优越性，向民主靠拢。民主在艰难中缓慢升起，放射光芒。

四、民本观念与集权制度

不论当皇帝，还是当什么官，或者任什么职，甚至做任何事情，都要想到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愿望。讨论什么问题，处理什么案件，创建什么事业，都要以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为决策的标准、理论的依据。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民本观念。至于许多人做事，议论问题，创立事业，处理案件，并没有考虑人民的利益与愿望，只要上级满意就可以升官发财。注重人民利益与愿望的人却得不到提拔。在这种情况下，民本观念就会逐渐淡漠，显得软弱无力。人民虽然有强烈的愿望，却也敢怒不敢言。虽然经过一段时间，这些人都会遭到报应，被人民所推翻，为历史所淘汰。那要经过较长的时间，

不是三五年就能有结果的。可见，人民在专制制度下，要多受几年痛苦，灾难更加深重。有人以为民本思想毫无作用，那也不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就是民本观念决定历史的明显证据。

中国与欧洲比较，欧洲动乱的时间和程度，也不比中国短和弱。中国统一、稳定常有上百年。从人口的多少也可以看出来，稳定时候人口大增，动乱时人口急剧减少。我们从人口的多少，也可以看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治乱状况。同样道理，在世界历史上，人口多少就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科学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中国汉唐盛世，都是人口较多的时代，在战国时代，在南北朝时代，在唐以后的五代，都是人口较少的时代。简单地说，治世人口多，乱世人口少。人口多少是综合标志，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科技（包括医疗水平）等方面。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技在十五世纪以前遥遥领先于西方，是同时代的欧洲所望尘莫及的。同样在十五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明，也都遥遥领先于西方，也是同时代的欧洲所望尘莫及的。这是过去欧洲人对中国的评价。现在欧洲人对历史有点生疏了，只知道眼前的现象，不知道欧洲以外的世界历史，也把他们的先人言论忘掉了，甚至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欧洲中心主义者的狂妄，以欧洲的观念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世界各国情况，以为任何重要的发明与创造都不可能产生于欧洲以外的地方。在欧洲文化强势的情况下，民主高于民本，成为普遍看法。但是，如果深入考察，我们会发现一些疑难问题。例如：西方采取选举的办法，认为这是最民主的制度，自然要举美国为例。为什么回避德国？希特勒就是德国民众高票推选出来的，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各国人民蒙受巨大灾难，也使他的选民遭受空前的浩劫。

中国的科举制度，尽管有一些舞弊现象，总体上还是比较公正的，是机会平等的。因为有合理性，这种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也得到过去西方人的高度赞扬。西方人喊平等若干年，

才从中国学到考试制度。怎么能说平等只是西方人的发现呢？我们现在的高考、公务员考试，是从西方学来的，那是出口转内销。而且，我们现在有的考试，远没有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严格和严密，对于舞弊的处理，古代也比现在更加严厉。以为现在一切都比过去好，是一种盲目性。

我们从世界历史来看，中国的落后只是近二三百年的事。在此前的两三千年中，中国并不落后，不论是科技水平，还是社会制度方面，中国都处于先进行列。那么，我们就感到奇怪：在过去的两三千年中，中国凭什么呢？中国既没有科学，也没有民主，西方国家既有科学，又有民主，为什么在各方面都落后于中国？如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所说，对于中国来说，欧洲还是“望尘莫及”的。我们应该如何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十五世纪以前，中国不论在政治制度，还是在科技方面，都不比西方落后。中国究竟有什么东西在起作用呢？在社会政治方面，中国有传统的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在维

系着中国的政治。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人民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管理国家事务的行政机关；人民政协是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重要机构。人民政协与人大、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在决策前协商，一个在协商后表决作决策，一个在决策后执行，三者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各司其职，相辅相成。这种协商民主的制度是逐渐形成的，逐渐完善的，还要继续发展。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实践证明了它的优越性，可行性。

本文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周勤勤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Zhou Guidian

Abstract: China has the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from its ancient time. After continuous development, there formed lots of theories such as “min gui jun qing” of Meng Zi, “ming wu wei bu ben” of Jia Yi, “li wei min yi” of Liu Zongyuan, and etc. Integrating the theories of people-oriented in Chinese history, we can conclud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eory of “people-oriented” as follows: the first is listening to the views of people; the second is stressing goodness, rather than believing in majority; the third is taking care of the minority after consultations. Only through these ways, can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be represented, and the true democracy be achieved. Voting is useful, but it inevitably leads to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majority to the minority. Facing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countries, invigorating our country is an important part to benefit people. Modern China inherits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absorbs the Western form of democratic voting, and creates the democratic system of voting after consultation, which has more advantages comparing to the democratic system of simply voting.

©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Key words: the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people-oriented; democracy; Confucian